

试论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

徐志明

(泰州市博物馆,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自隋炀帝开科取士到清光绪帝废科举,在科举考试中通过作弊以取得功名这种行为一直贯穿于 1300 年的科举史。本文主要对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和作弊工具以及对科考作弊的防范与处罚进行介绍。

[关键词]科举考试;作弊;夹带;贿考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42-02

古代考试选拔官员的形式称为“科举”。因选拔又称选举,又采用“分科取士”的方法,所以叫作“科举”。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始置进士科。进士科的设置,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6),举行了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后下诏废除科举。自隋至清,科举历时 1300 年,至此终结。

科举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在这遥遥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士子文人如果想取得前程、进入仕途,面前只有科举一条路,“十年寒窗苦,一卷定终身”,他们只能从这座独木桥上挤进官场,从这里取得前程。因此,在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每个人都是竭尽全力期盼着金榜题名,有些文人士子靠自己的十年寒窗真才实学而取得功名,也有些文人士子或是学业不精、或是想取捷径、或是为了自己能在考试中确保过关而采用歪门邪道,挖空心思用各种方法作弊。纵观中国科举史,科举考试的作弊方法最常见的有三种:一是贿买,二是请人代考,三是夹带考试经文入内作弊。

贿买考官就是向当科考官行贿,以求考官泄露考题,或在阅卷评卷时给予照顾。贿买考官自隋炀帝开科取士以来就存在,唐朝更是登峰造极。当时,贵族官僚、商贾富户家庭的子弟参加科考者无不行贿托请,而监考官也视贿买为游戏规则,借此敛财。贿考使得唐代科考几乎是有名无实,贵族官僚、商贾富户的子弟基本垄断了科举。晚唐著名诗人杜荀鹤屡试不第后曾慨叹道:“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唐以后各朝,贿买考官之风仍存,虽然各朝都想尽办法来杜绝贿买考官之风,如唐朝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法”,将考生的名字用纸粘贴遮掩,以避免批卷者认出写卷人,宋太宗时又订立了“锁院制”,以限制当科考官与外界接触,后来又实行了“誊录制”,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送往评级,以防批卷者辨认出考生的字迹。对贿考者的处罚也

较严厉,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发生“五闹弊案”,2 名主考和 18 名房官被全部处以死刑,数十人被判流放到辽宁尚阳堡、黑龙江的宁古塔。其间,顺治三次面试丁酉案南闹的江南举人,最后一次在 1659 年的农历三月,所有举人“皆集于太和殿前,股栗惊悚”,是时的北京正是三九天最为寒冷的季节,可怜几百名来自南方的举人,在咆哮飞舞的风雪中站立在青砖地上,一边研墨,一边思索,一手把纸,一手挥毫,真是苦不堪言。每名应试的举人身后都有两名手举大刀的御前侍卫监场,一旦发现有人舞弊,当场手起刀落。对此事,当时的书籍多有记载,如《三冈识略》说:“(是日)严霜厚三寸,鬼嚎不止。”孟森《心史丛刊》则说:“复试时既威之以银铛、夹棍、腰刀,又每一举人以两持刀之护军夹之。”王应奎《柳南随笔》说:“与试者悉惴惴其慄,几不能下笔。”虽然有如此严格的制度和严厉的惩治,但在名利面前,还是有人前赴后继、铤而走险,贿买考官之风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科考制度终结。

请人代考就是请“枪手”进考场代自己考试,这种现象在唐代就有,历朝历代,愈演愈烈,以童子试和生员的岁科两考为多。清代乾隆皇帝在一道谕旨中也指出:“京师举场附近,有积惯匪徒,窝藏枪手,专为场内传递文字。更有不肖举子,勾结外场巡绰兵役及闹中号军,走漏题目,关通传递。”可见会试中也有这种情况。为防止请人代考,历朝的科举试院都需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准考证。进考场前,考官根据履历、证件验明考生的身份。考生持证进入考场号舍,对号入座。对请人代考者的处罚也比较严厉,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对三名雇请枪手的童生、枪手及其他涉案者,先行枷号三个月,然后“发烟瘴之地面充军。至配所杖一百,折责四十板”,脸上还要刺上“烟瘴改发”字样。

这样的惩罚已与要犯相差无几。即便如此,请人代考者仍层出不穷,如清朝末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代考“枪手”,曾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皆得中举人。

在科举考试作弊方法中最普遍的当属夹带。夹带就是考生将“四书”、“五经”等考试用书,猜题押题在考前所写文章和八股文范文写在纸质或丝、棉质物品上,或直接携带特制印刷品,通过各种手段带进考场,以期在科考中能派上用场。一旦作弊成功,则考中概率大大增加。

把夹带带进考场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将夹带缝在衣服里面,也有将夹带藏在提篮(考篮)、鞋底、头发、毛笔笔杆内……更有甚者,直接把所需夹带进场的文章直接写在长袍内侧和内衣上。在山东就曾发现过一藏家手上有一整套科举考试作弊衣物,棉袍内侧、衬衣衬裤乃至内裤上都写满“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等作弊内容,洋洋洒洒数十万字,让人叹为观止。为了适应考生夹带作弊的需要,当时的市面上也出现了诸如带暗夹层的提篮(考篮),比一般砚台略厚、内部掏空的砚台,底部掏空的鞋子,小开本小字印刷的诸如“四书”、“五经”、《试贴诗》、《八股文精选》之类的书籍。

由于夹带体积不能太大,又要带海量的内容进入考场,考生就在所抄夹带的字体大小上绞尽脑汁。当时抄写夹带都使用特制的毛笔,比较常见的是用老鼠尾巴上的硬毛做成的毛笔,因为老鼠的毛相对较硬,弹性也较一般的羊毛或兔毛好。因此可以写很细小的字。抄写夹带用墨也有学问,要使用油墨,因为普通的墨写在丝织品上会渗开,这样就很难写得很细小。而如果是抄在内衣、手帕上的贴身夹带,用水溶性的墨可能被汗水化开。所以,当时都是使用印刷用的油墨,而不是写毛笔字的水墨来抄写夹带。用鼠毛笔和油墨抄写出来的夹带字体极细小,如江苏泰州市中国科举院试博物馆收藏的几件夹带,一件长 43.5 厘米、宽 20.5 厘米的绢质夹带上竟然抄写了 86 行 7740 余字的八股文章数篇,一件长 25.5 厘米、宽 18 厘米的纸质夹带上抄写了 92 行 6300 余字的八股文章数篇,且字字清晰可辨,可见当时考生为夹带作弊所费的心血。

除了手抄夹带之外,印刷本的夹带也有很多考生带进考场。印刷本夹带出现之初,由于受雕版印刷的版刻材料是木板,但是木版印刷印不出蝇头小字的限制,

所印夹带都是体积较大,所印之字也较大,随着印刷技术的改革发展,新技术如石版印刷、铜版印刷的出现,印出的夹带本体积越来越小,所印之字也越来越细小,如江苏泰州博物馆所藏的清光绪壬辰孟春上海石印本《五经小备旨》,全套 6 册,分别为“易”一册、“诗”一册、“书”一册、“礼”两册、“春秋”一册,每册长 6.3 厘米,宽 4.2 厘米,如火柴盒般大小,册内字体极为细小且清晰可见,用一粒米可以盖住 8 个字,此套《五经小备旨》保存之完整、尺寸之小、印刷之精细国内罕见。

到了清朝,携夹带进场考试已经相当普遍,清代包世臣在《上戴大司冠书》中说:“今年中式之士,后场条对话卷卷相同,误且同误,其为怀挟抄写,无可疑者。”乾隆十一年(1743)顺天府乡试,由于动用了军队进行搜检,不少考生赶紧抛弃身上所带的夹带。根据文献记载,考场外居然发现上千份夹带,堆积如山。有 2800 多考生临场脱逃,点名不到。可见夹带作弊在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各朝各代对科举考试夹带的防范检查也十分严格,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自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传卷或传话。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考生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对此规定也十分精细:“考生入场前,要排成一行,鱼贯而入以利搜身。考生帽子不准用双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衫袍都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一门、二门各搜一次,若二门搜出“怀挟”者,一门之搜检人员要予以处治。考生进入号房后,立即上锁,再不得出入号房和传递茶汤等。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是夹带这种作弊方法始终屡禁不止、层出不穷。

中国科举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演绎了 1300 年的作弊与反作弊史,有人因作弊成功而金榜题名,也有人因作弊失败而丢了性命。中国古代腐败的官场风气也给科举考试作弊提供了良好的滋生土壤,以至于通过开科取士所录用的人员良莠不齐,科举考试的弊端由此而现。